太宰治与卡夫卡“罪”意识探源

何 双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太宰治和卡夫卡这两位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作家间并无明显联系,也不存在相互影响的确切证据,但他们两位思想中共同存在明显的“罪”意识。“审父”的恐惧、存在的根本性不安、人之“原罪”的审视、时代罪行的反思,是两位作家“罪”意识的共同表现。同时两位作家“罪”意识的产生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份意识、民族文化和时代病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两位作家“罪”意识根源所在,有助于我们以更开阔的视野掘进作家创作的灵魂和他们生命的深处。这既能揭示两位作家“罪”意识根源的相同因素,又能呈现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和伦理价值的差异。

关键词: 太宰治; 卡夫卡 “罪”意识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8)06 - 0029 - 06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Osamu Dazai's and KafKa's Consciousness of "Sin"

HE Shu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Osamu Dazai and Kafk are two writers coming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lthough they have no obvious connection and no mutual influences on each other, there is a clear consciousness of "sin" in their thoughts. The fear of "trial father", the fundamental uneasiness of existence, the examination of man's "original si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rimes of the times are the two writers' common expressions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sin". At the same time, the "sin" consciousness of the two write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identity consciousness,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that times. Using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the two writers' consciousness of "sin" is helpful for us to dig into the soul of their creation and depth of their lives with a broader vision, which can not only reveal the same factors to the origin of the two writers' consciousness of "sin", but also show th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the ideology, culture and ethical values.

Key words: Osamu Dazai; Kafka; consciousness of "sin"

太宰治(1909 - 1948)作为日本无赖派[①]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卡夫卡(1883 - 1924)是20 世纪表现最好的犹太裔德语作家。表面上两位作家并无直接关联,也不存在互相影响的内在因子,但“巧合”的是他

① 无赖派:日本二战废墟上诞生的重要文学流派,是战后文学重要的坐标。太宰治最先提出“无赖派”一说,并在理论中论述,创作中加以实践。其他代表作家作品有:坂口安吾的《白痴》、石川淳的《废墟中的上帝》、田中光英的《野狐》》等。无赖派不满战后社会的无序,企图如实记叙虚无、混乱的社会,对权威充满反抗意识,以自嘲和自虐的态度对待生活,常以戏谑的口吻表现战后日本社会的萎靡,专写病态和阴郁的东西,以颓废抵抗社会。

收稿日期: 2018 - 01 - 18

作者简介: 何 双(1979 -),女,江西分宜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们都共同表现出“罪”意识。若能以两位作家思想间的契合点——“罪”意识为切入点对两位作家做一番平行研究,或许能开拓卡夫卡和太宰治研究的视野,提供研究的另一种方法。

基督教中所强调的罪,是指自己的行为与宗教中的戒律相左。“罪”意识作为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名词,指的是基督教文化关于人性恶、“人生而有罪”等观念,强调的是人因本性之罪而产生深深的罪恶感、负罪感,主要体现罪与罚的意识。而本文中所说“罪”意识并非必然指向基督教文化层面的“罪”意识,也指在面对人生、人性和现实的一切“障碍”时产生的自卑、内疚、不安、恐惧、负罪等综合心理,同时表现出对自我的反省意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和反抗意识,甚至于“爱”的意识。

太宰治和卡夫卡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自觉的“罪”意识,二者“罪”意识都共同指向“审父”的恐惧、存在的根本性不安、人性“原罪”之审视、时代罪行之拷问。“罪”意识不仅印烙在他们的生命中,而且浸透在他们的创作中。我们将从家庭背景、身份意识、民族文化和时代病症等层面来考察两位作家“罪”意识的形成及表现。

一、强大父权下“审父”的恐惧

无论是太宰治还是卡夫卡,他们都体验过共同的亲缘之痛和父权的压制。他们面对父亲的强悍、亲情的缺失、渴望爱却又不得,从而陷入一种“被抛弃”的恐惧深渊中无法自拔,这是他们共同的亲缘之痛。这种亲缘之痛化作讨伐的匕首,将利刃刺向父权“审判”父亲。审父的恐惧又凝聚成一股控诉的力量:自我“控告”。亲缘之痛特别是父权的强大是两位作家“罪”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

日本是个信仰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国家,“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辈分、性别、年龄来确定自己的地位。”[1](p48) 日本的家庭采取严格的子嗣继承制,父亲和长子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利和地位,弟弟们要服从和依赖父兄。虽然太宰治出生在贵族之家,但第六子的地位注定他无缘得到家人的重视。多病的母亲极少照顾孩子,太宰治极度渴望爱却不得,自童年起他就深陷被抛弃的恐惧中。身为贵族议员的父亲在社会上的出色地位和家庭中绝对的权威,使得处于家庭边缘地位的太宰治感到羞愧和恐惧。为此,太宰治深感不安,自卑而抑郁,甚至觉得自己是“异类”。犹如其自传性小说《人间失格》中的叶藏一样,太宰治最终被逐出家门,被家人遗弃,“多余人”的担忧和恐惧纠缠了太宰治一生。

太宰治不仅是日本无赖派小说代表作家,其创作也具有日本私小说风格特征,他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人生的自画像,许多作品人物都有他自己的身影。《人间失格》中“丧失为人资格”的叶藏就是太宰治的投影,叶藏因“失格人间”最终被送至精神病院。结尾酒吧老板娘那句人物“这都得怪他那个厉害的父亲”,[2](p117) 十分耐人寻味。“父亲”是一个可怕的缺席存在,他对叶藏没有丝毫温暖。当叶藏得知父亲病故后,他终于得以长舒一口气,“父亲已经不在了。那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心中的熟悉而可怕的存在,已经消失了……”,[2](p112) 显然太宰治在这里表达了隐藏在内心对父亲的不满,甚至借用叶藏这个人物传达了他对日本社会强大而冷漠的家庭等级秩序的抗议。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日本家庭中,父亲更多的只是家庭意志的权威而不是有血肉亲情的亲人,家族成员只能服从父亲的意志却感受不到父爱。成年后的太宰治因叛逆家庭与妓女同居被逐出家门,就是日本严苛的家族制度的最好证明。太宰治对等级秩序的代表——“父亲”自然没有好感,甚至充满怨恨和鄙视。在他的笔下,“父亲”一般都是冷漠、自私、邋遢、无能的形象。无论是《父亲》中的“我”,还是《樱桃》中的“我”,都是让人心寒的自私懦弱的父亲。“可是父亲颇乏味地吃着盛在大盘子里的樱桃……一边在心理虚妄地嘟囔着:父母比孩子更重要”,[3](p177) 这是作为父亲的“我”多么羞耻而又无力的辩白。

同时太宰治在讨伐那些父亲的同时也对自己做了反省,拷问了自己。日本是个讲究孝道的民族,受父母恩惠必须“报恩于一万”,“不忘恩情”在日本人习性中占有最高地位,负恩则是一种羞耻。尽管父亲在家庭中的冷漠伤害了孩子,但孩子责怪、批判父亲就是一种负恩行为。太宰治借笔下人物的自白表达了对这种负恩行为的反思,叶藏如是说“我的不幸却是全部缘于自己的罪恶,所以无法向任何人进行抗议”;[2](p104) “我活着只不过是在龌龊的罪恶上增添可耻的罪恶……活着即是罪恶的种子”。[2](p109) 这番表白无疑透露出了太宰治因自己“负恩”于父亲的羞愧之情和耻辱感。

卡夫卡生于布拉格一个普通犹太人家庭,父亲能干强势,对孩子的教育粗暴专制。虽然是头生子,但是卡夫卡却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关爱,反而完全被忽略了。对此,卡夫卡感到无助和愤怒,既恐惧又负疚。更可怕的是自己对“夺爱者”——两个弟弟的幻想式谋杀,变成了骇人的事实:两个年幼的弟弟都不幸夭折。这对卡夫卡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给他留下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使其内心充满了犯罪感和恐怖感,这种犯“罪”意识伴随其一生,卡夫卡对犯罪和惩罚的恐惧从未消失。

生活在强势父亲阴影之下的卡夫卡一生都在努力挣脱因父亲强权带来的压迫感和窒息感。马克斯·布罗德曾指出,卡夫卡曾有意“想把他所有的文学作品聚集在一起,作为他的一种‘从我的父亲身边逃脱出来的尝试’”。[4](p173) 孩提时代,父亲那粗暴残忍的专制行为给卡夫卡造成了巨大伤害,在卡夫卡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恐惧的种子,从而导致“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负疚意识”。[5](p122) 卡夫卡试图通过结婚和经济独立来逃离父亲,但努力尝试逃脱父亲的卡夫卡一生都未能成功,他和他笔下的卡尔、格奥尔格、格里高尔一样败北。这场“儿子们”对父亲们的反叛

注定是一场败仗。《美国》中卡尔一开头就被父亲放逐到美国，处境艰难，甚至最后成了失踪的人；《判决》中格奥尔格也只能顺从地接受父亲的判决“去投河淹死”；《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更是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沉沦，连“儿子”的身份都消失了。儿子们处境艰难，毫无战斗力，父亲们的地位和权威不可撼动。父亲作为“统治者”，儿子作为“奴隶”的世界格局永远无法改变。在身材高大、精明能干的父亲面前，卡夫卡自惭形秽，觉得自己瘦小无能，犹如“虫豸”。因此，卡夫卡对父亲有着特殊的“情结”：既依恋又抗拒；既憎恨又敬爱。一方面想挣脱父亲束缚但又因不得不依赖父亲而惴惴不安，怀有深重的负罪感；一方面想抗拒父亲，但又因抗拒父亲而自感有罪。

在卡夫卡的“审父”意识中始终伴随着“负罪”感。这种负罪意识不仅来自作为儿子对父亲天然的依恋之情，也来自卡夫卡因受犹太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敬父意识。犹太教文化中，父亲形象和上帝影像往往是重合的。“犹太人信仰上帝是和信赖家庭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并不等于祖先崇拜，不过二者的区别有时确实模糊不清；将上帝奉为父亲往往蜕变成将父亲奉为上帝，尤其是在父亲去世时。”[6](p16) 故此，审父的心理中难免掺杂着对上帝的敬畏，牵动着人们心灵深处的原罪感。

因为血缘亲情的匮乏，太宰治和卡夫卡极度渴望爱，然而始终未能得到满足，这种爱不得和多余人的心理使他们终生沦陷在被抛弃的不安中。父权的强大更使他们深感恐惧。“父亲”成了他们缺乏亲情之爱的讨伐对象，更是他们批判传统势力的靶心，但这种讨伐因为日本民族的报恩意识和犹太人的父亲与上帝同在的思想加剧了他们“审父”的负“罪”意识和恐惧意识。

二、身份危机带来的存在焦虑

如果说“审父”的恐惧源自两位作家成长中父权的强大以及爱的缺失与渴求的话，那么身份认同危机则造成了他们终生存在的根本性不安。当然，太宰治存在的不安性主要源自其大地主家庭的出身，卡夫卡无家可归的恐慌主要缘于其犹太人的血脉创痛。

日本哲学家三木清曾指出，由于受到一战后西方随“人格解体”而出现的不安的思想与文学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文坛也面临“不安”的危机。太宰治就是陷入“不安”的作家之一，其实不仅在 30 年代，他的一生都由于身份困惑而陷入存在的焦虑不安中。在等级秩序森严的日本社会，津岛家族有着更为严苛的等级尊卑观，出生于津岛家族的太宰治自小就对等级制度表现出了叛逆倾向。无论在幼年时期还是在小学时代，太宰治都因出身地主家庭感到孤独和痛苦。这种因阶级身份带来的痛苦一直如影随形，于是高中时代的太宰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左翼运动，勇敢背叛自我的出身。但原本就困惑于地主与农民是敌人关系的太宰治，实在难以接受革命运动的残酷无情。剥削阶级大地主之子的身份使他深感自己并无资格献身革命，他认为地主阶级终究难逃灭亡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进一步加深了太宰治对出身于大地主阶级的罪恶意识，同时对左翼运动的背叛又使得这种罪恶意识更加深重。太宰治痛苦不已，无路可寻，这种苦闷不堪的生活渐渐演变成一种根本性的不安，犹如《人间失格》中主人公叶藏所言“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现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还不如到牢房里更能够让我解脱。”[2](p40)

为此，尽管太宰治出身富贵，却同情贫弱，常常将目光投向普通平民世界，《樱桃》、《父亲》、《阿珊》等作品无不如此。叶藏从小由保姆抚养长大，喜欢和佣人们亲近，对贫贱的常子感到亲切，在妓女的怀抱里感觉很安全……这和有意叛逆家庭的太宰治如出一辙。太宰治甚至不断地在作品中确证自己作为“庶民之友”的身份，在《津轻》中“我”大声宣布“我是阿竹的孩子，就算别人说我是女佣的孩子也绝不在乎。我可以大声宣告——我就是阿竹的孩子。”[7](p173) 他终于发现了自己心中的母亲是佣人阿竹，并得到了内心的平和，以此确认了自己与庶民平等的身份。然而这种“庶民之友”的自我身份认同真的是确定无疑吗？叶藏虽然和东京的庶民堀木正雄结交，但心里却蔑视堀木正雄并耻于与他交往。《斜阳》则是太宰治献给没落贵族的挽歌。太宰治在给作家井伏鳟二信中曾提到“津岛家的没落就好像《樱桃园》所描述的那样，正在走向衰败的边缘，我的家乡现在就是《樱桃园》。”[8](p16) 此番话语透露出作为大地主之子太宰治面对家族没落无比落寞与失望的心情。《樱桃园》中的直治虽然努力向“庶民性的庸俗”妥协，却终没能如愿，最终走向毁灭，可谓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贵族。叶藏叛逆地主之家却又怀抱贵族之情，走进平民却无法认同其“庸俗性”。游离在地主与平民身份间的叶藏找寻不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生活得痛苦而又颓废、不安而又放纵，感觉世间就是“人间地狱”。这种因阶级身份困惑而产生的“根本性的不安”是太宰治的命运之殇，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犹太人备受捷克人和德国人的歧视，犹太人只能居住在环境恶劣、拥挤不堪的犹太城。“黑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难以近身的旅店”，[9](p42-43) 这就是卡夫卡幼小心灵中“肮脏的犹太城”一览图。为了脱离犹太人聚集地，海尔曼夫妇尽心竭力关照生意，整日惶惶于生意的好坏，试图努力进入布拉格上层社会。父母这种生存的不安、焦虑、恐慌毫无疑问转嫁到了卡夫卡身上。成长中父亲的专制野蛮、母爱的持续缺席，使这种存在性的不安与日俱增。卡夫卡在给蜜伦娜的信中说“我的本质是：恐惧。”[10](p64) 卡夫卡存在的不安意识和恐惧意识源于他对“犹太人”身份的认同危机。

犹太民族是历经苦难的民族,自公元 3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半叶漫长的岁月里,犹太民族因失却家园而不得不四处流浪。身为犹太人,卡夫卡对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流散之苦深有感触,他说"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10](p179) 备受歧视的民族血统和民族地位是卡夫卡永远的精神创痛,无家可归的处境让人痛苦而惶恐。《城堡》中 K 的遭遇十分形象地道出了犹太民族找不到家园的痛苦和孤独。令卡夫卡惶恐不安的不仅是作为犹太人要承受漂泊流浪之苦,更因为作为犹太人的他却远离犹太传统,并非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他和自己的民族身份是割裂的。罗杰·加洛蒂曾说"卡夫卡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但同时也是一个与犹太人社会决裂的犹太人。"[11](p109) 生不逢时的卡夫卡经历了捷克种族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而感到痛苦,但后来他又因自己不是一个地道的犹太人而恨自己。悖谬的布拉格孕育了卡夫卡悖谬的存在:生活在捷克,国籍上属于奥地利,文化上属于德意志,但血统上是纯粹的犹太人,却又几乎和犹太人的宗教、文化隔绝,甚至被剥夺了使用母语创作的权利。在卡夫卡看来,"语言就是存在的家,是存在的基石,人失去了语言,就失去了'家',没有了立身之本。"[12](p107) 这一切造成了卡夫卡终生难以摆脱的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感和负罪感。借助文学,他以寓言的形式将面对这种难堪处境的惶恐不安表现了出来。《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异化为虫,具有"虫形人性",既不被人接受,也无法在虫的世界生存,"他/它"就这样漂浮在人与虫的世界,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无所皈依。《猎人格拉胡斯》中的猎手只能"既生又死地一直漂流在世上,似乎要为某种'莫名之罪'而永远东奔西走,不得安宁"。[9](p224)

无论是太宰治徘徊在贵族和平民阶级间产生的身份撕扯,还是卡夫卡因失落了犹太人民族身份产生的异己感,太宰治和卡夫卡同样面临的是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而这种危机则是造成他们根本性不安的基本根源。

三、"圣经"指引下"原罪"的审视

任何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太宰治和卡夫卡也不例外。受各自民族文化影响的他们都共同表现出了"原罪"意识。所不同的是,太宰治因受日本"道义"文化和《圣经》的影响,其"原罪"意识中不仅有基督教意义的罪恶意识,也含有日本耻文化的羞耻意识。而受犹太教影响的卡夫卡认为人类犯有原罪,人的本质是"罪性"的,是一种"原罪"意识。

日本道义文化中"道义"一是指"对社会的道义",即对社会普通大众的报答之情,包含对家人的责任和报恩,二是指"维护自我名声的道义"。太宰治的一生显然有违日本道义文化的要求,为此他充满了羞耻感。对于家庭而言,作为儿子,他叛逆家庭与妓女同居,有愧父母之恩;作为丈夫,他夜夜笙歌纵酒作乐,未尽丈夫之责。《樱桃》《父亲》等作品中那个自私、怯懦的"我"无一不是太宰治自我审视的自画像。特别是对左翼运动的背叛和出卖,更是成了太宰治一生的梦魇。对左翼运动的背叛违背了"道义"精神中的"忠",太宰治因未能维护自我名声而深感痛苦和羞耻。同时受圣经文化影响的他,因"出卖"革命而背负深深的罪恶感。《越级上诉》就是选材犹大背叛耶稣的著名基督教故事,以犹大的口吻叙述了自己背叛耶稣的原委及矛盾的心情。在这部作品中太宰治控诉了自己背叛左翼运动的罪,认定自己是罪人,把自己等同于犹大,对自己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总决算。太宰治并不是基督徒,但《圣经》对他的影响相当大,他一生始终背负着沉重的"罪"意识。太宰治自感罪孽深重,以致于产生"人人有罪"的幻觉,《维庸之妻》中"我"认为"并且不光是店里的客人,感觉连走路的人,背后也一定隐藏着见不得人的罪孽。"[3](p120) 以《斜阳》为契机,太宰治开始关注每个人会犯的罪孽。太宰治的作品是他与"罪"意识纠缠的记录,笔下的主人公常常背负着"罪"的枷锁。比如《人间失格》中的叶藏,他始终觉得自己有罪,充满"罪犯意识",叶藏说"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罪犯意识'。我在这个世上,虽然一辈子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可它又像是我的糟糠之妻一般,两人相濡以沫,孤寂地耳鬓厮磨,这已然成了我活着的样式。"[2](p39) 叶藏这番话将罪犯意识描绘得淋漓尽致。《人间失格》通过大庭叶藏自白自己的罪过展开故事,毫不留情地揭露人类共有的罪恶、丑陋、自私、伪善。这种"罪"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基督教的"原罪"意识。

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从未用犹太人的形象做主角,甚至连配角也没有,他宁可将自己一贬到底做动物。[13](p10) 并非卡夫卡不爱自己的民族,而是他所经历的种族歧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H·布鲁姆评论说"如果以一种无穷的复杂方式来看,卡夫卡所写的所有东西都和他与犹太人以及犹太传统的关系相关。"[14](p96) J·L·伯格斯也评论到"同'现代文学'相比,卡夫卡更靠近《约伯书》。他的作品建立在宗教意识上,特别是犹太人的宗教意识。"[14](p95) "犹太人信仰上帝是和信赖家庭联系在一起的",[6](p16) 家庭是犹太民族传承文化传统最根本的方式和渠道。卡夫卡身上的犹太文化特性则是来自其家庭生活无形的影响和渗透。

犹太人并不把犹太圣经和法典看成是宗教,而是看作与上帝订约而遵循的教诲和训诫。触犯上帝诫命、背约就是罪的本质。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破坏了人神约定,是背约行为,这就是人类始祖所犯下的"原罪"。同时犹太教认为人类从伊甸园中被放逐,是人因"罪性"而开启的受罚赎罪漫长不归路,即便弥撒亚降临,人类也永远地失去了伊甸园。如卡夫卡所说"逐出天堂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永恒的。"[15](p9) 不同于基督教认为人类历经了"末世"劫难后能够蒙恩获救重返天国,犹太人认为末世论中的天国只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人间"王国"。正如卡夫卡所言"目

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15](p5) 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人并不是通过信仰上帝来否定自己的现实生活，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经受灾祸与劫难来感知自己的“罪性”，以此来确证律法和诫命的有效性以及人与上帝之约的牢固性。诚如卡夫卡所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恶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性无关。”[16](p140) 他还说“有时候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懂得原罪。”[17](p170)《美国》中卡尔因为“偷吃禁果”被父亲送去美国，他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恰恰是因人之罪性而被逐出天堂的确证。《审判》中约瑟夫·K 无故被捕却保持一切自由。K 无法忍受这种“莫名之罪”和“悬而未决”，但他试图弄清自己犯了什么罪以及如何洗刷冤屈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因为 K 所面临的谜题是，罪恶如何在犯错之前就已经产生而且无法弥补。[14](p58) 因为“世人不仅是因为犯了罪而成为罪人，人更是因为是罪人而犯罪”。[18](p91) 那种“不由分说”的原罪，让我们“虽死耻辱却依然存于人间”。人类永远也无法洗清那“不由分说”的原罪，因为那是人类本质的原罪。卡夫卡如是说“否定原罪，就是否定上帝，否定人。”[15](p367) K 被“莫名之罪”压倒的一生就是人类“罪性”的永恒存在。在卡夫卡这里，人类犯有“原罪”，人的本质是“罪性”，人的存在即是“罪性”的确证。

受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影响，太宰治和卡夫卡都产生了“原罪”意识，太宰治对于人之原罪的认识，受基督教原罪意识影响，他认为“人人有罪”；同时因受日本道义文化和耻文化的影响，其“罪”意识中夹杂着一种羞耻意识。与基督教认为肉的忏悔禁欲可以洗涤灵魂罪孽的认识不同，卡夫卡的“原罪”意识更多受到犹太教文化的影响，认为人的存在整个的与罪性相伴，末日的“天国”并不存在。

四、时代病症引发的罪行拷问

时代是孕育思想的沃土，太宰治与卡夫卡“罪”意识的形成自然离不开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虽然两位作家所处时代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共同见证了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两位作家都敢于直面生活的真实，深刻地反思时代的罪行。不同的是太宰治习惯以表现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来反思人类不义战争的罪恶，卡夫卡则直击人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异化”来审视时代问题。

太宰治是诞生于二战后的日本重要文学流派“无赖派”的代表作家，是战后文学重要的坐标。无赖派文学常以戏谑的口吻表现战后日本社会的萎靡，疏于主流，以颓废抵抗社会。一向以颓废风格著称的太宰治却在战时一改其面目，创作了《新解诸国故事》《御伽草纸》等风格幽默的作品，给战时的人们以慰藉，大大缓解了战争所产生的紧张气氛。但轻松、幽默的笔调一样也透露出了战争中人们不安的心理。《十二月八日》中主人公自言自语地说“日本真的没问题吗”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不管战时还是战后，太宰治都是一位正直的作家。以“战后”为视角，太宰治描写了战后动荡社会中人们极端贫困、精神萎靡、信仰缺失的生活。《父亲》中的作家无论是战时、战后都是那样脆弱不堪，他无力面对现实，“炉边的幸福。为什么我做不到呢？实在有些无地自容。炉边让我觉得害怕。”[3](p60)“我”既为自己的脆弱感到羞愧，可又依然沉浸在绝望中难以自拔。《樱桃》中的丈夫怯于面对现实，极度软弱，一家人艰难度日。《维庸之妻》中百姓贫穷，举步维艰，生活朝不保夕，商人甚至不惜贩卖假酒来维持基本的生活。战争摧毁了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又未形成，日本社会陷入混乱和虚无中，困惑、不安与绝望笼罩着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叮当叮当》中那时时在耳畔响起的“叮当叮当”的敲击声不仅打破了战败士兵们准备自杀的严肃氛围，也敲碎了生活的意义，“那个从远处传来的微弱的铁锤声，奇妙地剥去我军国主义的幻影，使我不再醉心于既悲壮又严肃的噩梦”。[3](p34) 战后日本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很多人陷入了虚无。这一切无一不刺激太宰治对战争、对社会、对自我的反思。《斜阳》就是一部人们反省时代罪孽的作品。该书以没落贵族为书写对象。复员士兵直治，出身贵族世家，在贵族没落的时代，留恋贵族身份却不得，想融入民众又反感他们的庸俗而不能；不满战后世界，却又无能为力。深陷痛苦的直治整日酗酒嫖妓，吸毒麻醉自己，终日过着颓废空虚的生活，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如果在直治的绝望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他微弱反抗意志的话，那么无良作家上原二郎则是一个无责任感也无羞耻感的堕落之徒，他失去信仰的灵魂十分丑陋。《人间失格》则将这种自身罪孽的反省进行地更为彻底和深刻。叶藏是个“神一样的孩子”，对人类感到恐惧，他在纯洁的良子身上找到希冀。然而纯洁的良子却遭人玷污，叶藏彻底失去了对人的信赖，对唯一信赖的美好品质也产生了疑问：纯真无暇的信赖之心难道也是罪过吗？这是叶藏对神灵发出的质问，也是叶藏对无耻社会、丑陋人性的控诉。人类的罪恶、丑陋、自私、伪善在叶藏的自白中被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出来。

英国当代诗人奥登曾评价说卡夫卡之所以对我们重要是因为他的困惑也就是现代人的困惑，英国小说家卡内蒂则认为卡夫卡是把 20 世纪表现得最好的作家。确实，卡夫卡捏住人类生命的痛处，抓住时代的脉搏，为文坛贡献了能够给世人“猛地一击”的绝佳作品。卡夫卡生活在欧洲动荡不安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充满危险。布拉格便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卡夫卡对布拉格这个充满危险的城市感到畏惧，他痛苦地感觉到在布拉格呆久了，他不仅感到恐惧，甚至连他对人所抱有的要求都变成了恐惧本身。哈布斯堡王朝历代实行专制统治，奥匈帝国时期虽然经济上已是资本主义方式，但在政治上仍实施暴君式的强权专制，在其统治之下的人们被奴役、被压迫，毫无反抗之力，独裁统治像一个无形的魔掌控制一切。三十三岁的约瑟夫·K 莫名被捕，却不知何罪之有，但最终却受到“无罪”审判。本雅明曾如此评价

道“从《诉讼》可以看出,这种诉讼对被告来说,常常是毫无希望的。即使当存在被宣判无罪的希望时,也是毫无希望的。”[17](p32) 可见奥匈帝国法律的任意妄为,只见其残酷和荒谬,丝毫没有法律的神圣。不论你做了什么,甚或什么都没做,你也无法逃脱“法”的魔掌。这种神秘的、不可捉摸而又折磨人的“法”只是奥匈帝国强权统治的冰山一角。在卡夫卡心目中,哈布斯堡王朝就像一个庞大的怪兽,它盘踞在那儿,占据一切,不可抗拒。可怕的是在这种独裁统治下,千万小民生活可怜,丧失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陷入一种离开强权奴役反而无法生存的荒诞境地中。《城堡》中阿玛丽娅拒绝了城堡中一个小官吏的求婚而导致全家人惊惧不已,弟弟为了赎罪无偿给城堡当信使,妹妹不加选择地与城堡的每一个人睡觉,变成一个粗俗不堪的妓女,父亲一夜衰老,每天疯疯癫癫地跑到村口向城堡的官员求饶。邻居们也及时和这家人划清了界线。在绝对的专制强权下,人们已经成为了强大官僚机构的牺牲品,“慑强”成为威权统治下人们的共同基因,这种自请奴役的热情和疯狂不禁令人心寒。战战兢兢、惶恐不安是 20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存的常态。20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激化,政治、经济、道德、信仰各方面都危机重重,这种危机意识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引起了一种普遍的失望与恐慌心理。《地洞》中的鼹鼠为自己精心造了一个洞,但时时担心巢穴被侵袭,担心财物被盗,担心重物压垮自己的家,成天胆战心惊,提心吊胆,处于高度的戒备和恐慌中。鼹鼠惊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生存危机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普遍处境。无论是绝对的强权专制,还是强权下自请奴役的人们,以及惶恐不安的鼹鼠,无不表明现代社会、现代人异化深重。异化已然是人类不可逃脱的宿命。《变形记》是卡夫卡将人的异化灾难呈现得最触目惊心的作品。格里高尔变形为虫看似荒诞,但却是现代人随时都可能面临无妄之灾、遭遇精神浩劫的最形象表述。在 20 世纪动荡不安的欧洲社会,卡夫卡以其独有的敏锐感知时代气息,以生命的火焰锻造出可以击碎人们心中冰山的佳作,揭示现实的罪恶,拷问时代的罪行,呈现人类可怕的异化,讲述现代人的寓言。

作为有良知的作家,太宰治和卡夫卡的目光投注于现实,他们的创作直指社会和人或隐或现的“罪孽”:关于战争的罪恶,关于人的异化劫难。时代的罪行在他们的笔端赫然昭示。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太宰治与卡夫卡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罪”意识,而且二者“罪”意识产生的根源同样是家庭、身份、文化和时代因素。父亲的强权使他们产生了“审父”的恐惧,身份认同的危机带来了二者存在的根本性不安,人之“原罪”的审视来自宗教文化的浸润,社会罪行的反思是对时代病症的探诊。但毕竟两位作家生活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有着不一样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意识。因而,“罪”意识的具体表现自然存在差异,在“罪”意识的牵引下各自创作的方向,甚至生命的最终走向也不同。某种程度上,两位作家都是生活中的“弱者”,面对充满罪孽的世界,写作是他们面对自我“罪”意识的理想方式,也是他们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对于太宰治和卡夫卡而言,写作既是“罪性”的存在,也是“罪性”的拯救。不同的是前者以弱者的任性、颓废反抗“公序良俗”,自虐式的放纵堕落;后者以弱者的执着、坚韧反抗现存秩序,自省式的近靠上帝。二者反抗的行为迥异,共同的是反抗的姿态。

参考文献:

[1]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王 颖,杜翠云编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2] 〔日〕太宰治. 人间失格·斜阳[M]. 竺家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3] 〔日〕太宰治. 维庸之妻[M]. 陈 龄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
[4] 胡志明. 卡夫卡现象学[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5] 〔奥〕卡夫卡. 致父亲:天才卡夫卡成长的怕与爱[M]. 张荣昌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英〕查姆·伯曼特. 犹太人[M]. 冯 玮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7]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太宰治[M]. 魏大海,侯 为,邵程亮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8] 太宰治:生而为人,我很抱歉[M]. 茶乌龙主编.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9] 林和生. 地狱里的温柔:犹太歌手卡夫卡[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10] 〔奥〕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致蜜伦娜情书[M]. 叶廷芳,黎 奇译.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11] 〔法〕罗杰·加洛蒂.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M]. 吴岳添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
[12] 曾艳兵. 卡夫卡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3] 周双宁. 看不见的城堡:卡夫卡与布拉格[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4] 〔英〕Steve Coots. 卡夫卡:迷途的羔羊[M]. 张 振,刘 洵译. 大连:大连理工出版社,2008.
[15] 〔奥〕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全集(第 5 卷)[M]. 叶廷芳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6] 叶廷芳. 现代艺术的探险者[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17] 叶廷芳. 论卡夫卡[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8] 陈昭荣,李春霞. 基督教与西方文学[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刘伏玲)